

● ●
(英) 迪克·威尔逊 著
萨 夏 海 林 李维周 竺际春 等译



周恩来传

111
013
283

周恩来传

1898—1976

〔英〕迪克·威尔逊 著

李维周 竺际春 等译
萨夏 海林
文燕 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90 2 8

CHOU

The Story of Zhou Enlai

1898—1976

DICK WILSON

HUTCHINSON

London Melbourne Sydney Auckland Johannesburg

First Published 1984

责任编辑：张坚石

封面设计：王 岐

周 恩 来 传

1898—1976

〔英〕迪克·威尔逊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印张 259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6次印刷

印数：200001—220000册

ISBN7-5035-0163-4/K·9

定价：4.50元

目 录

序 言	(1)
1 一再过继 (1898—1913)	(5)
2 负笈天津 (1913—1917)	(15)
3 蹈海 (1917—1919)	(25)
4 在狱中 (1919—1920)	(33)
5 在法国的战斗 (1920—1924)	(43)
6 革命婚姻 (1924—1925)	(59)
7 在上海被捕 (1925—1927)	(69)
8 南昌的试验 (1927)	(78)
9 重获俄国人的信任 (1928—1930)	(91)
10 一个魔术师被搞掉了 (1931—1934)	(100)
11 长征路上 (1934—1936)	(113)
12 虎入陷阱 (1936—1940)	(128)
13 一只烤乳猪的变化 (1940—1943)	(149)
14. 世界是我们的 (1943—1949)	(159)
15 一套天蓝色的睡衣 (1949—1952)	(178)
16 日内瓦和万隆 (1953—1955)	(191)
17 百花齐放 (1956—1958)	(206)

18	收拾残局（1959—1961）	（219）
19	征程万里（1962—1965）	（230）
20	文化大革命（1966—1967）	（241）
21	被红卫兵围困（1967—1968）	（264）
22	联系白宫的桥梁（1969—1976）	（278）
尾	声	（303）
总	结	（307）
后	记	（318）

序 言

“啊，天呀！你一直在这里等着呢！你知道，记者招待会已经改变了。我们是在秘书处大楼举行的。但是却沒有通知你。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敢肯定总理会单独接见你一次以做为补偿……”

那位尼泊尔礼宾官员，戴着他那白色高帽，穿着宽大的白色宫廷礼裤把我引到一大群刚刚到达拉南宫的人们中间去。他们逐渐让开了，人群中显露出一位看上去有些疲倦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面。按照原来的计划，周在这次1960年对尼泊尔的访问中应在他的住处、古老的拉南宫会见世界的新闻界。王宫位于尼泊尔王国首都加德满都中心约三英里之外。访问中国的客人是我到尼泊尔来的原因之一，在他们访问的最后一天，因为我要为我的杂志办一件事，而错过了关于记者招待会改变地点的通知。

在午夜原定时间，我单独到拉南宫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却发现除了两个穿军装但昏昏入睡的廓尔喀卫兵外，那里已空无一人。我小心翼翼地越过他们，在那占据整个底层的象粮仓似的大厅中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有大量的雪茄烟蒂和鸡骨头撒满了铺满整个大厅的地毯上，没有中国客人，也没有尼泊尔官员。

而现在我却面对着这位62岁的中国总理，他以优雅和颇有兴

致的姿态接受了进行一次补偿性采访的建议，虽然我未赶上记者招待会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尼泊尔人的过错。已经是午夜之后很久了，几个星期来马不停蹄旅行的中国代表团将在第二天清晨飞走。每个人都累了，但周的团里的十几位官员，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都立等着这次计划外的会见结束，然后他们才能去睡觉并准备他们的行程。他们中有些人带着掩盖不住的恼火神情注视着我。

但周却不是这样。在40分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引起我的注意，这其间他表现出礼貌和耐心。我觉得有点不安，我只限于提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即关于中国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如何通过周的访问而得到改善，指望得到简略的答复。但周却极其详细地回答，就所访问过的每一个国家做出分别的答复。这样，总共进行了约半个小时，包括译员所用的时间。确实，我最后发现他谈的实际上同记者招待会上讲的一样，因此我的单独采访并没有太大价值。

如果只有周一个人的话，我会接受他的要求而提出更多的问题，但是还有陈毅正在不安地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来支持他那相当壮实的身体，以及一些级别较低的中国人正用眼角看着我，我决定结束采访。但周却并不收场。继续着谈话，似乎时间还多着呢。他问我去过中国没有？我是否知道蒙哥马利将要访问中国？我是否也想去？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起来。一年半以来我一直试图去中国而未能成功。

总理突然用中学生的英语说道，“欢迎你”，并且挥动双手做出接受表示。

中国的官员们彼此看了一下，好象在说，“总算完了！”于是我走出来步入喜马拉雅山的寒冷夜气中。这就是一场梦。

周善于使事情看起来象梦一样，但却不太善于使梦变为现实。后来我给他写了许多次信，但却从未再听到关于邀请的事。几年以后，在蒙哥马利去过并离开之后，我才做了对中国的第一

次访问，但是周给我的第一次印象仍记忆犹新。他以全面的专注满足我的需要，完全没有妄自尊大或任何优越感。若不是他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权威的风度（这反映在他的助手们的恭敬态度中），他的行为几乎是谦逊的。

在那一特殊的时期中，相当多的中国人正在挨饿，俄国人将要取消他们的经济援助，中国感到被怀有敌意的美国所包围，而且尼赫鲁不愿意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妥协。但在一个漫长的工作日的末尾，这一天又是临近在飞行中的连续许多工作日的末尾，在那40分钟中，周看起来除了我的问题外似乎心中没有别的事，尽管这些问题曾经在以前被其他的新闻记者们一再提出过。

在我一生的采访中，强有力的领导人如肯尼迪或尼赫鲁常常给我这类感觉，但从来没有这次如此强烈。周几乎对他会见的每一个人都造成这种印象。他是中国旧时的和蔼、礼貌和谦恭美德的化身，但把这些美德服务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暴力和破坏做为其纲领中的必要部分，这是这位文雅的总理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迷惑不解之处。他谈吐如此温和，行动如此文雅，但为了在一生中间使他的国家迅速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现代化，他所说所做的某些事情却是富于战斗性的、无情的。

周对不同的文明产生不同的印象。大陆欧洲人对他的才能和智慧普遍印象深刻。《世界报》的标题“一位革命的绅士”总结了这种表面的印象，亨利·基辛格发现周是他所见到的“两个或三个给人以最深印象的人物中的一个”，说他“文雅，具有无限的耐心，非凡的智慧，敏感。”哈马舍尔德^①声称周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对于法国外交部的马纳克来说，中国总理是“一位完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内心反应稍有不同，但都同样表示倾心。象基辛格一样，白修德^②发现周是他所见过的三位伟人中的一

^① 前联合国秘书长，死于飞机失事。——译注

^② 美国名记者，抗日时在重庆采访，写出不少关于中国的书。——译注

个，“在他的面前，我几乎完全中止了怀疑”。他说周“能以绝对的果敢行事，象猫扑鼠那样灵巧……但他能表现出温暖的和和蔼，抑制不住的仁慈和优雅的礼节……他完全赢得了我的爱戴。”但是后来，当白修德把1949年后共产党政府的过火行为同周联系起来后，他改变了他的看法。于是出现了其他看法，用丹尼斯·布拉德沃思的话来说，周“也许是他们中最好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更顽强的革命者，对资本主义是比那位主席本人更为危险的长期敌人”。

这样一个人如何获得他想改革他的祖国并使之民主化的愿望呢？这是关于周恩来的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做为这种变革的最佳工具。第三个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第四个谜是，为什么在毛泽东的疯狂而遗害无穷的越轨行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还继续支持他的这位老对手。

周、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周更为开明，信任更多的人，对世界历史具有更广阔的了解，去过的地方更多，也接见过更多的访问者。但是对隐藏在这位微笑的官员和迷人的外交家下面的真正的周，还需要更多的挖掘。

当我在加德满都那个4月的夜晚离开拉南宫的时候，我充满良好的感觉，那就是周恩来已经朝着我投射过来。我欣赏他的风采和他的本领。但后来我开始思索隐藏在他的机智、敏捷和洞察力这一切后面的个性和私人感情。这项好奇心导致我在20年后描绘了这个人和他一生的工作。

一再过继

(1898—1913)

在淮安那座优雅的上层阶级住房很不象是一位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总书记^①的起步之处。但是在靠近中国东海岸的那个美好的市镇中，力图保持官僚阶级虚荣的周氏家族的没落绅士们，对于在1898年3月5日降生给他们的男孩终将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总理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异的。他们会觉得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假如你今天到江苏省的淮安，你将会被引导沿着一条白墙的胡同来到那座老房子，挂着一面新的纪念牌：“周恩来总理故居”。这不是一所宏大的房子，只有一层，但那砖墙是很厚的；支撑屋檐的木柱子雕有花纹，传统的中国灰瓦把目光引向天空。

在里面，会指给你看周降生的房间，他祖父的客厅，他父母的房间，以及院子里一小块菜地和一口古老的井。它是老式的，在当前现代化过程中熙熙攘攘的乡间却是一个平静的小岛。按乡下的标准，它代表着一种高雅风格。

城镇座落在大运河边上。运河是以往皇帝的非凡的人工河，把中国的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连接起来，穿过一些沼泽地、湖泊和水道，使江苏的中部看起来象中国的荷兰。这就是周恩来家乡城镇的位置，长江流域的丰产稻田使它富庶起来。

① 原文如此。——译注

周恩来在大学入学表格填写他的出生日期时，写的是“民国前十三年”——这个共和国是中国知识界所向往的，而周曾尽了他的一份力量使之巩固。在旧世纪正逝去时降生的周，在他童年时度过最末一个统治中国的封建满清皇帝的合乎时代的最后几年。

他家的长辈都是有教养的绅士，但时运不济……欧洲的列强正在屈辱中国，强占她的领土，并且强迫她按难以容忍的条件接受它们的贸易。衰败的皇权统治者对此却一筹莫展。

周的父亲贻能（1877—1942）具有当时典型的漠不关心的情绪。他是一位失意但快活的绅士，为长期统治中国的破落官僚体制所不容，他从未能获得县长的职务，虽然这本是他的教育所应该赋予他的。当他的这个著名的儿子出生时，他只有21岁。这个孩子取名为恩来，意思是“恩惠的到来”，预祝父亲所指望的成就。但是贻能空等了一场，只获得一个省政府财政部门的一项不重要的职务。几十年后当周成为总理时，他常常相当严峻地回忆起他的父亲，“一个月薪不足30元的地方官员”——当时约合30美元。^①

这位父亲和蔼而谦让，但同更有成就的兄弟们相比则相形见绌。他逃脱生活的压力，尽可能享受他那微小的闲差事，借酒和诗来消遣。在淮安住宅墙上发黄的照片上，他带着和蔼的松散神态，穿着老式肥袖马褂，面貌粗犷但却散发着安静的机智。

假如他的父亲曾获得“成功”，周可能会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上层阶级的观点。事实是，生活在他后来描绘为“破产的官僚家庭”中——或者用他的一位中国传记作者的话，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懂得贫穷意味着什么，他的不公平感增加了。按中国生肖属相，周是在狗年出生的，因此，中国的占星家会指出他是正义的潜在维护者——表现是谨慎，有魅力，但感情上冷

^① 在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的元约等于美元。——原注

静，善于找出毛病，又倔强。

周恩来的母亲是万冬儿(1877—1907)^①，是出自当地名门的一位有教养的姑娘，精于音乐、绘画、下棋等中国妇女的传统技艺。她在家宅中的照片显得沉静、美丽，并显出明显的智慧，但没有受到教育培养，不幸的是她自己的父亲在她分娩周恩来后第二天逝世了，她的悲痛可能使她对这个男孩失去了兴趣。

周却从他父亲家庭这一边，主要是三位不平常的叔伯中间得到抚爱。周的祖父，那位传奇式的周攀龙，任过显赫的官职，在19世纪70年代中间由他的弟弟陪同来到淮安。在淮安，攀龙与当地曾家结亲，生下了4个儿子。后来，他退休到了家乡绍兴，在浙江省，位于淮安之南约300英里，那里以绍兴酒、师爷和藏书闻名。他带着他的4个儿子，但不久他们就回到淮安的曾家，按照一种说法，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去世了，他们的父亲又结了婚，他们不能忍受年轻继母的管教。曾家富有，可以很好照管这4个男孩子。

按照中国传统，以父亲的老家做为自己的原籍，周恩来虽然出生在淮安，却常常声称“我的老家是绍兴”。据说他和他的兄弟和堂兄弟每年都要回到祖父攀龙在绍兴的祖宅，向祖先的牌位致敬，并拜访周家曾五世同堂住在一起的著名的“百年堂”。

如果周恩来真是这样尊重绍兴的牌位，这可能反映了他从一开始就受到他3位叔叔的照顾——除了这3位而外，家里通常把同辈的两位堂兄弟，即祖父攀龙的兄弟的儿子加在一起，总共有了5位“叔叔”。他们构成显赫的一群。其中3人是举人。一位成了高级行政官员和地主，另一位是商人，第3位是经过训练的治安官，第4位是三省督察的书办。

周恩来的童年不是典型中国上层阶级孩子的平静的田园式生活。在4个自老家迂回的兄弟中周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当他

^① 冬儿是万氏的小名，系万青选之女。——译注。

还是抱在怀中一个4个月的婴儿时，就给了他的叔父贻害，那时叔父已经病重并将无后而死。过继并不意味着搬家，因为许多叔父都同周的父母住在一个院里。周氏大家庭这种集体精神的突出表现，通常解释为周的生父希望确保他的临危的兄弟，由于有了儿子使他的那一支在家庭的谱系中能继续保持下来，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最近去淮安参观的人，另一种说法是为了治好这位叔父的病。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这次过继并不成功。

一位中国作家曾评论说，这一插曲表明“中国传统总有一种办法来解除那些没有能力抚养子女的父母的罪过”。人们难免要怀疑这位生父的不负责任，以及生母由于哀痛她自己父亲的死可能使他们不能共同哺养这个孩子。这就意味着从很小的时候起周恩来就尝到被抛弃的滋味，这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因为他的生身父母以后接着生了两个儿子，而他们把这两个孩子都留在家中，当然，周恩来后来对他生父的态度一直是苦涩和恼怒的。

按照一种记载，在过继之后不久他的继父就死了，使还是婴儿的周恩来遭到不幸，还不到1岁的时候就两次失掉父亲。他留给守寡的继母哺养，继母很严厉、非常聪明并深通世事，她来自淮安的陈家，是整个家族中最出色的妇女，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他后来就称她为“母亲”，象他通常称他的生母那样。

继母陈氏受的教育很少，据说是由于她的脾气暴躁，使人无法教她。她从不会阅读，她的技能只限于通常妇女干的操持家务，做饭和刺绣。但她大力建立起她的权威，常常教育孩子们要懂规矩。当她站起来时，没有人，甚至连周也不敢继续坐着。当她生气的时候，没有人敢说话——除非是周，他可能带着安静的微笑提出一些小心的建议，或试图使她平静下来。她对周表示一定的好感，因为他举止良好，并且比她自己的孩子恩硕^①更聪明。她思想敏捷，例如她能同当地的佛教师傅坚持讲她的道理。

① 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堂弟。

她的爱好之一是讲故事，特别是反叛权威的经典故事。在她的膝下周恩来吸收了这种影响，可能是要使他反叛家庭权威的梦想合法化。后来，他的同事们惊异于他对这些故事的广泛知识，以及这些故事仍然能够燃起他的兴奋。他说，“我感谢我母亲的教导。没有她的照顾，我就不能培养出对学术追求的任何兴趣来。”

这位妇女最不凡的行动之一是请了一个“红毛”，一个西方的传教士，到家里来教她的两个孩子。因此，周恩来不同一般地早就接触了西方人物，并且热衷于学英语和“新学”。陈氏不顾邻居和亲友们批评的反传统行为，严重违反了当时的风尚。排外的义和团运动是在周恩来降生的那年发难的，当时欧洲帝国主义分子想抢占更多中国领土的渴望达到高峰。那时把一个西方人带到家里来，表现出思想上的巨大独立性。

不过还有另外一位妇女对周恩来的性格的发展起了塑造作用，她就是家中的奶妈，她很喜欢周，并且常告诉他在周家院子外面农民的艰苦生活。她给他讲述50年前太平军造反惩罚贪官并给穷人分钱的故事。

周恩来6岁时，他的生母有了一次中兴。她和她的兄弟两人中了10,000元彩，足够他们试图在淮阴（现在叫清江，从运河上溯约10英里）重建他们破落的家园。一群奇怪的家人陪伴她到达那里，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周的生父），周恩来，周的两个弟弟（恩溥和恩寿），他们一直留在贻能的家中，以及周的继母，大概还有继母生的弟弟恩硕^①。周的三位活着的“父母亲”在这次冒险中来到一起，表明对于以前的分离不应该过于重视。周还是一直留在同一家庭的宅院中，虽然他最亲密的关系从这个家族中的一个分支转到另一个分支。

在淮阴，周浏览了他外祖父的大量藏书。在那里的3年中，他培养了对唐诗的爱好（他后来以他对古典诗篇的准确记忆使他

^① 见8页注①。

的朋友们吃惊)。

那是他生活中较为光明的一段。不幸的是，他生母中彩得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她的健康也随着她的财产而失去了，而中国的这块地方那时正被饥荒和经济衰退所破坏。当时9岁的周恩来要跑当铺，找邻居借钱，并从药铺里抓回药来帮助他生病的母亲。然而她已经不能救治了，终于在1907年去世。

正象他甚至在一岁时就“失去”了两位父亲一样，周恩来现在刚10岁又失去了两位母亲。他的继母很快追随他的生母也走入坟墓。他从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一个继承是血统方面的，第二个继承则是文化方面的，但是他对她们的排列一向是清楚的。他后来解释说，“我的婶母当我还是一个婴儿时就已经成为我真正的母亲。直到我10岁时我甚至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10岁时她和我的生母都去世了。”

这肯定是周的生命中最坏的时刻，这是在他还未脱离童年之前。他和他的减少了的亲人悲痛地回到他们原来在淮安的家，比过去更穷了。只有那忠实的奶妈留下照顾周和他的父亲，以及年轻的弟弟们。他恢复了去当铺的差事，并在院子里负责种菜供大家吃。

但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好处是，有许多条路敞开给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人。别的叔伯们现在开始对周恩来感到兴趣。据说其中一位在一次去淮安时同周谈过话。根据另外一项记载，周恩来自己主动给两位伯父写了信，这听起来更象周这个人，后来他的弟媳回忆说，周“侃侃而谈并善于行动，常常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在1910年春，当他12岁时，周离开了他的绿树成荫的家乡去到遥远而干燥的北方东三省，日本正贪婪地注视着中国的这一部分。当时有两位伯父在满洲的省会沈阳(那时叫奉天)工作，周先留在开明的贻谦那里。他在一个税务局工作，并且乐于向他的侄子如实地指出国家正在四分五裂，以及需要哪些变革来恢复权威和效率。周开始读一些改良者如梁启超等人的书籍和小册子，这种思想

是帝国朝廷试图加以压制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留着辫子，而且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古老陈旧的东西，甚至没有地方容纳资本主义——那是以后才知道的。经过很长时间我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几个月周进了附近的一所私塾。但不久他的另一位伯父贻庚(他没有孩子)把他带走，并送他进入好得多的东关模范小学，它位于沈阳老城的东门附近。学校是教会办的，比其他学校更为进步。周在那里学了3年，书法和英文是班上最优秀的。他的一篇作文被列为全区的模范，另一篇被收入书中印了出来展览。

他对付恶棍学生的策略是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反复使用的，那就是同那些被作弄的孩子交朋友，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共同阵线来反抗那些恶棍学生。不过有一位同学说他“腼腆”，特别是让他高声朗读的时候。

不象别的孩子，他似乎确实知道他要学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学。他在家中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有一次校长问大家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通常回答是“为了发财”或“为了得到好职业”。据说只有周恩来回答说：“为了中华之能够崛起而读书。”

十几岁的年轻的周恩来，现在离开了女性的世界，开始了他终生同思想世界的交往，周围是新派的年长男性人物——他以前家中的疏远的伯父和学校中的新老师。史地老师高亦吾介绍给他一种激进的新杂志，其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政治概念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词句。周开始知道了达尔文、穆勒、卢梭以及由宪法保证的人权概念。通过康有为的著作，他追求博爱、大同和理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这种理想在他那一代的中国人中间不乏热衷者，其中包括在湖南省另外一位富于思想的十几岁的人，他叫毛泽东。

年轻改革者们包括周在内的打击目标是，政府对大众的愿望不负责任，治理中国的专断形式，掌权者拒绝考虑甚至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而这种改革在欧洲几个世纪以来视为理所当然

的。妇女的卑贱地位，妇女缠足^①这种痛苦和腐败的习俗，以及对知识活动和教育的严格限制。

周的数学老师协助指给他一个革命的方向，给他看著名的《新民报》，其中梁启超以丰富的热情谈到当代的不公平。这两位老师告诉周恩来应该将他的感情和不满引向何处去，他们谈到早期中国改革者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说得周和他的同学们怒极而泣。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的第一年有机会把这些思想部分地付诸实践。1911年革命党人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并代之以中国的一个共和国。当革命的浪潮涌到沈阳的大门时，教历史的高老师剪掉了他的辫子，藐视朝廷关于每个男人都要留辫子的荒唐的老规矩。周恩来也剪掉了他的小辫子，并且联合那些从这个满洲的外来习俗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但是，由于革命党分成不同集团和派系，各谋私利，他很快就感到失望了。

唯一表现出有点希望的政治集团就是在1912年包括孙中山在内所建立的国民党，其纲领是使共和国具有国会制度。周后来做为它的党员渡过了他的政治成长年代中的一段时间。

来自鱼米之乡，大地终年呈嫩绿色，周发现中国北方苍白而奇异。其他的同学都长得高一些并且壮一些，他们叫他“小南蛮子”，意思也就是“蛮横的小家伙”。他们吃高粱（一种杂粮）和面，而不是他习惯吃的碾米。他后来回忆道，“我在1910年来到沈阳，在那里住了三年。我来的时候还留着辫子。我的身体能像现在这么好是由于沈阳的高粱以及吹向黄土地的大风。”

周回忆说，“住在东三省有许多优点。当我在学校的时候，不管冬夏我们都得到户外做体操，使孱弱的身体锻炼得较为强壮了。另外一项好处是他们吃高粱，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变得粗壮了，还锻炼了我的胃，因此，后来我的身体能胜任

^① 认为女人的脚越小越好看，这种风尚发展到在婴儿时就使脚变形，以致使妇女难于行走。周后来承认，“我的母亲就缠了足。”——原注